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国家“211”工程“民营经济与创新”项目承担机构



简报

(总第3期)

本期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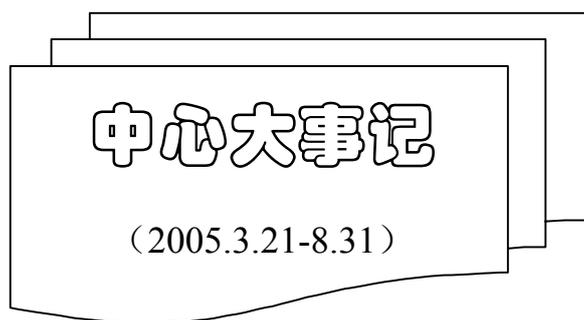
- ◇ 中心大事记 1
- ◇ 成果摘撷 8
- ◇ 中心视窗
 - ☑ “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企业的作用”中日双边研讨会综述 14
 - ☑ 义乌国际化：战略意义、转型方向和制度支持 22
- ◇ 时事评点
 - ☑ 人民币升值，行业影响几何？ 28

主 编：史晋川
执行主编：叶建亮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IN PRIVATE ENTERPRISE, ZHEJIANG UNIVERSITY

2/05



**2005 年 3 月 27 日，庆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获
批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 CRPE 发展研讨会 (2005)
隆重召开**

浙江大学前任党委书记张浚生教授、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部长罗卫东教授、浙江大学发展规划部王家平部长、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及 CRPE 各研究所所长、专职研究人员出席了此次 CRPE 发展研讨会。会议伊始，罗卫东部长宣读了教育部文件；胡建淼副校长代表学校为张浚生教授颁发 CRPE 理事长受聘聘书。随后，与会人员针对 CRPE 的创新平台建设、科研工作及规划、规章制度完善等方面进行了充分探讨，进一步明确了“相对独立、资源共享、试验改革、示范带动”的基地发展思路，努力将 CRPE 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开放型的学术研究与创新平台。



**“中国民营企业区际化与国际化扩展”国内学术研讨会
于 5 月 29 日在杭州百合花饭店举行**

会议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民营经济与国际化研究所”主办，主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与区际化扩展”。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

大学、上海市政府对外经济主官部门的专家与浙江本地部分高校、省委政策研究机构、政府产权交易机构以及企业的专家们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部分师生集聚一堂，就民营企业空间扩展论题进行了严肃而不失活跃的交流。

会议由“民营经济与国际化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与肖文教授轮流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谢康研究员、同济大学经管学院陈飞翔教授、复旦大学田素华博士、上海大学李骏阳教授、浙江产权交易中心颜春友教授等与会嘉宾作了精彩的发言。会议就民营企业国际化及区际化研究最新成果进行了广泛交流。各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民营企业是否应国际化以及如何国际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的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独到的见解。

会议分为上下午两段，上午主题发言，下午讨论，会议场面自始至终充满活跃气氛。由于与会专家来自两大相邻地区的不同机构，信息具有互补性，充分融合了理论与实践，并对学术界及政府、企业今后在民营企业国际化道路的摸索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此次研讨会属于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211 工程”项目——民营经济与国际化发展子项目实施重要内容之一，该子项目由赵伟教授主持。“211”工程民营经济研究总项目由史晋川教授主持协调。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赴南京师范大学讲学

2005 年 3 月 18 日下午，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史晋川教授，给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做了一场题为《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以浙江为例》的精彩报告。

报告尚未开始，南京师范大学宽敞的国际会议报告厅内已经济济一堂，由于座位有限，许多求知若渴的研究生同学甚至甘愿站着旁听。当史教授在南师大商学院院长李晏墅教授、副院长许坚老师、卜海老师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向大家致意后，史教授开始了正式的报告。

作为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史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浙江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在报告中史教授深入浅出地向大家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四种典型模式，尤其对浙江的“温州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西方经济史上

的“地中海商圈”详细描述了其特点和历史背景，同时指出温州模式的缺陷并且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建议。整个报告紧凑精辟，富含哲理，展现了史教授渊博的学识和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海外背景经济学家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在史教授的报告结束后，参加报告会的师生们纷纷踊跃向史教授发问，史教授一一予以耐心解答。最后，南师大商学院院长李晏墅教授发言，对史教授的演讲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并对史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



美国北卡罗林拉大学夏洛特分校统计学教授 Zongwu Cai 访问 CRPE

2005 年 5 月 31 日下午，美国北卡罗林拉大学夏洛特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统计学教授 Zongwu Cai 访问 CRPE，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秘书长汪炜副教授、朱秀君副教授、蒋岳祥教授、肖文教授、黄先海副教授等 CRPE 部分研究人员与 Dr. Zongwu Cai 就合作教学和合作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晚上，Dr. Zongwu Cai 在 CRPE 双周论坛上做了题为“Survival, Duration, and Hazard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的报告，反响强烈。



2005 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在台北胜利召开

由浙江大学与台湾世新大学合办的“2005 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于 2005 年 5 月 26-27 日在台北世新大学胜利召开。作为会议发起学校和主办方，我中心的史晋川教授、余逊达教授、陈剩勇教授等 14 位浙大学者前往参加了会议。来自台湾省内的台大、政大、世新等高校的在该领域的台湾一流专家学者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市场经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市场经济与公共政策”、“民营企业人才战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职

能”、“两岸的地方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比较”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有成效的交流和讨论。会后大陆学者还去东海大学、暨南大学进行了座谈和访问。通过这次会议，两岸学者既交流了学术研究心得，又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民间互动架起了沟通桥梁。

根据此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双方均真诚希望这一学术交流形式能以轮办形式每年举办一次。双方决定，2006 年会议拟在我校举行。



史晋川教授出席省“十一五”规划重点调研课题汇报会

6 月 7 日和 9 日，省委召开“十一五”规划重点调研课题汇报会，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省长吕祖善、副省长王永明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作为省委“十一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建议起草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并就发展战略目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浙江经济对外开放问题作了汇报发言。



2005 年 6 月 14 日“中国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和美国 Cornell 大学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心 (CSEC) 联合主办的“中国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于 14 日上午 9 时在中心 418 会议室隆重召开。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洛林教授，美国 Cornell 大学 Victor Nee 教授，瑞典 Loud 大学 Sonja Opper 教授，Houston 大学维多利亚分校商学院喻春生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王森教授，康奈尔大学 John De Bary 博士、Mark Jacobs 博士、Zun Tang 博士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史晋川教授、金祥荣教授等 30 余位国内外专家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分上午、下午两场，上午半场学术研讨由 Victor Nee 教授、肖文教授、钱彦敏副教授和 Mark Jacobs 博士、蒋岳祥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主题报告；下午半场学术研讨邀请省内部分政府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中国尤其

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学术研讨。通过此次会议，浙江大学民营中心将与美国 Cornell 大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双边学术交流与合作。



2005 年 6 月 18-19 日 “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学术研讨会” 隆重召开

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联合主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承办的“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6 月 18-19 日在杭州隆重举行。家族企业在当代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影响力已越来越为各界所关注。在我国浙江,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活力源泉, 是所有制优势、市场先发优势、区域产业优势的集中体现。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到国内外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知名学者 Jesus Casado 教授 (西班牙)、Li-Choy Chong 教授 (瑞士)、李新春教授、储小平教授 (中山大学)、韩朝华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臧旭恒教授、杨惠馨教授 (山东大学)、甘德安教授 (江汉大学)、许琳博士 (美国) 等, 还有来自香港、北京及浙江的企业家茅理翔先生 (浙江方太)、陈仰宗先生 (香港)、章鹏飞先生 (浙江现代)、郭梓林先生 (北京科瑞集团) 等。学者、企业家同台交流, 共商民营企业成长和发展问题, 堪称民营经济研究领域的国际盛会。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陈劲教授主持,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陆瑞芬、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倪明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鲁世杰到会祝贺并致辞, 本次国际研讨会学术主席,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作为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办方代表致词, 对来自国内外民营经济领域的老朋友和新朋友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和感谢。

本次研讨会学术讨论为期一天半, 议题深入丰富, 围绕“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这一核心议题, 就创业和中小企业成长、创业教育、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家族企业现代转型、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成长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地探讨。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案例研究”单元中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陈凌教授、曹正汉副教授做了关于浙江飞跃集团和正泰集团的

成长案例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提交相关论文 35 篇。此次研讨会属于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211 工程”项目——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子项目实施重要内容之一，该子项目由陈凌和罗卫东教授主持，211 工程民营经济研究总项目由史晋川教授主持协调。本次研讨会同时得到香港思源基金会、香港择善基金会的资助。



2005 年 6 月 24 日 CRPE 与香港 RFP 协会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和香港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有限公司（RFP-HK），于 6 月 24 日在浙江大学举行合作签约仪式。香港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正式授权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负责浙江省内 RFP 资格培训。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和香港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副会长、英国财务会计师公会香港分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冼伟超先生等嘉宾出席了签约仪式。首期 RFP 证书培训正在筹办中。



2005 年 6 月 26 日 CRPE 与美国康乃尔大学 CSEC 商议建立长期合作研究关系

2005 年 6 月 26 日晚，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教授在知味观—杨公堤店宴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CSEC）Victor Nee 教授一行四人。Nee 教授十分感谢 CRPE 对他们此次来浙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支持帮助，同时向史教授表达了与 CRPE 建立长期的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合作研究意愿。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 8 月份史教授在美国逗留期间具体商讨合作研究计划。该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一旦实施，将大大促进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对双方研究机构将提供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研究水平的机会。

宴会期间, Nee 教授还邀请史教授等 CRPE 研究人员能安排时间参加明年 10 月份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举办的“China's New Capitalism: From Local to Global”国际研讨会。



2005 年 7 月 1 日 “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与制度环境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

2005 年 7 月 1 日, 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浙商网、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ES) 和美国商务部国际中小企业中心共同举办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与制度环境国际研讨会”在金溪山庄隆重召开。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宋顺峰教授、林双林教授,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颜旭若副局长,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卓勇良所长, 金义集团董事长陈金义先生等 50 余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致欢迎词,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原会长宋顺峰教授介绍了 CES 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的关注和研究成果,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现任会长林双林教授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研讨主题、内容和目标等。

金义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金义先生、杭州美通日用品公司董事长徐力先生、杭州恒生公司执行总裁刘署峰先生、浙江省人民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卓勇良所长、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颜旭若副局长、分别作主题发言, 博得会场阵阵掌声。与会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就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与制度环境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通过举办此次会议,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美国商务部国际中小企业中心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扩大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2005 年 7 月 2-3 日 “2005 义乌论坛：国际化与民营经济发展” 隆重召开

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2005 义乌论坛：国际化与民营经济发展”于 2005 年 7 月 2-3 日在义乌市锦都酒店隆重召开。CRPE “义乌论坛”以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为顾问单位，由中共义乌市委和义乌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每年一届，每届确定一个主题。论坛主旨是开展义乌经济现象的深入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协作和互动发展，为政府、专家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合作、共赢”的平台。2004 年举办的第一届义乌论坛主题是产业与市场互动；2005（第二届）义乌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化与民营经济发展。

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蒋省三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丛明司长、CRPE 理事长、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张浚生教授、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沈建明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杨树荫副院长，以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等诸多重要研究机构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义乌市市长吴蔚荣等义乌市党政领导，金华市各市县、义乌市的友好城市政府代表共 200 余人，以专家演讲、交流对话等形式，就政府在民营经济国际化发展中的作用、利用义乌小商品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建立区域发展伙伴关系等民营经济国际化的各个层面的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论坛的举办，将进一步促进政府与市场的交融、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2005 年 7 月 26 日 美国 Lehigh 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翁文龙教授访问 CRPE

翁文龙教授是浙江大学 78 级校友，现在美国 Lehigh 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此次回国，耳闻目睹国内民营经济的兴旺发达，特前来 CRPE 访问。2005 年 7 月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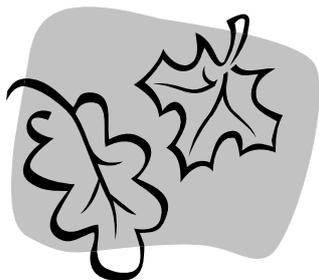
日，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在 CRPE 接待了翁教授。

史晋川教授介绍了 CRPE 成立的背景、发展过程、机构设置、学术团代建设、主要研究项目及主要研究成果。翁教授对 CRPE 的运作机制及已取得的成果十分赞许，认为 CRPE 的工作对推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第一，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如果选题对口，将前来 CRPE 做合作研究；第二，愿意做“红娘”，为 Lehigh 大学与 CRPE 之间建立访学关系做出努力。接着，两位教授又探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股市波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前景等。会谈结束后，史教授陪同翁教授参观了 CRPE 的资料室和研究人员的办公室。



2005 年 8 月 26 日-31 日，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竹内常善教授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东亚研究所东茂树高级研究员访问 CRPE

此次访问是应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之邀，讨论双反学术合作与交流事宜。金祥荣教授与竹内教授一直合作开展东亚地区工业化与企业集群问题的研究。竹内教授多次出访中国，并专程来浙江调研，他对浙江经济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此次来访，除共同讨论双方即将完成的合作课题“浙江省永康地区企业发展与产业集聚”的有关事宜外，还进一步讨论了双方下一步研究合作有关意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东亚研究所也表达了开展双边合作研究的意愿。访问团还在金祥荣教授的陪同下，奔赴义乌、永康、台州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





史晋川

波斯纳与《法律的经济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2005(1).-58-64

- 内容提要：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为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将在介绍波斯纳的研究经历、研究方法及其财产、契约和侵权理论的基础上，就波斯纳对法律经济学的贡献做出简要的评价。



金祥荣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China and Congo (with KAMITEWOKO Edwig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Science in Engineering), 2005(4)

- INTRODUCTION The goal of this investigation was to find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married women participation in the urban area labour force in Zhejiang (China) and Brazzaville (Congo).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is study is correct and the resulting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basically depends on her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ge, education, presence of additional adult in the family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Brazzaville and Zhejiang. However, the number of children significantly affects only Brazzaville urban married women.

**赵伟****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分析与趋向预期****国际贸易问题.2005(1).-108-111**

- 内容提要：从总体规模、分布结构、并购动机、方式与效应等角度入手，考察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作了前瞻性预期

**顾国达****日本侵占台湾时期对蚕丝业的开发与资源掠夺****丝绸.2005(2).-45-47, 49**

- 内容提要：实证分析了日本侵占台湾时期对蚕丝业的开发与资源掠夺问题。日本在侵占台湾期间对蚕丝业开发可分为 1896—1911 年的试验开发阶段，1912—1921 年的奖励开发阶段和 1922—1945 年的放任阶段三个时期。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安置移民，强化其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次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蚕丝业资源，把台湾作为日本国内蚕种余缺调剂的生产基地和蚕茧原料基地。

**王维安****我国外汇干预机制有效性探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35(1).-135-142**

- 内容提要：由于制度背景的特殊性，我国外汇干预无法通过利率、资产组合和预期机制对汇率稳定产生倍增效应。相反，由于内外经济周期非一致性和干预目标过于狭窄，市场收益变化反而引起国内资产结构的逆向调整，加大了人民币失衡压力。最后，央行通过大规模直接干预的方式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却导致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受央行资产结构和债券市场规模等因素约束，外汇占款投放的人民币没有被完全冲销，存在较大缺口，并对基础货币预期增长目标和内部均衡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因此，人民银行要尽快

转变被动的干预方式，扩大汇率波动的目标区间；同时，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促进政策之间的协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实现干预成本的最小化。



王维安

房地产市场区域性风险扩散机制研究

财经研究.2005, 31(1).-15-24, 89

- 内容提要：文章关注于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区域风险，从房地产市场的内部结构来讨论房地产风险产生和传导的机制。针对房地产企业的跨地区投资行为所可能引发的房地产市场区域风险的扩散问题，构建了双市场模型进行分析。并以浙江丽水房地产市场为例，对模型的结论作了“邹至庄检验”，得出房地产市场区域风险通过资本跨地区流动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扩散的结论，最后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王俊豪

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改革——以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机构为例

中国工业经济.2005(1).-56-62

- 内容提要：管制机构对垄断性产业的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分析中国垄断性产业现行管制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具有独立性的管制机构的优越性，讨论美国和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管制机构的特点，最后探讨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规范问题。



王志凯

透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一个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 01 期

- 内容提要：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不断进步的，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目标是一致的，并被认为

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直接贡献力量。亚洲福利经济素以政府小规模公共开支的低成本作为其发展的优势，尽管这也意味着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与西方社会的福利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这也预示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上可能比西方走得更远。宗教和文化的交融，实际上是规制了亚洲福利经济低水平发展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发展，最终会更多地向接近西方特别是欧洲健全的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经济模式靠拢。而中国适时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蒋岳祥

A class of not max-stable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Science in Engineering), 2005(4)

• INTRODUCTION In Jiang (2004a; 2004b) we considered the case of mixing two sequences, with $m=2$, and proved that the limit distribution is often still an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hence max-stable. But in some cases mixtures of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The sequences $\{Z_i, 1 \leq i \leq n\}$, $n \geq 1$ have multi-nomial distribution among i.i.d. random variables $\{X_{1, i} \geq 1\}$, $\{X_{2, n i i} \geq 1\}$, ..., $\{X_{m, i} \geq 1\}$. The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GZ(x)$ of this particular triangular array of i.i.d. random variables $Z_1, Z_2, \dots, i n n r ?1 Z_n$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 found a new type of not max-stable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s, $GZ(x) = \prod_{i=1}^n \Phi_{\alpha_i}(x) \times \Phi_{\alpha_r}(x)$.



陈凌

专亲属还是聘专家：浙江家族企业接班问题考察

管理世界.2005(2).-133-142, 145

• 内容提要：国内关于家族企业接班问题的研究感性议论的多，实证分析的少，本报告依据对以正原公司为代表的 17 家浙江私有企业的分析，探讨了国内私有企业目前在选择经营接班人问题上的基本行为特征。我们的主要发现：第一，企业初始体制的公有程度与企业的经营家族化程度之间存在某

种关联,即初始体制公有程度较高的企业,经营家族化程度较低,而初始体制公有制程度较低的企业,其经营家族化的程度会较高。第二,在经营家族化程度和依赖外部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的程度之间存在某种负向的关联,即经营家族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较少,而经营家族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会较高。第三,经营家族化程度不同的企业在成长速度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主要的利润率指标上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即经营家族化程度高的企业利润率水平较低,而经营家族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利润率水平较高。第四,私有企业主在接班人选择上的首选对象是其子女或亲属,但他们对接班人的能力也有较高要求,因而对于这些企业主来讲,选拔经营接班人不太可能是一种只讲感情不问能力的非理性过程。第五,经营家族化和经营职业化之间并不绝对相互排斥,因为两者都要涉及“关系文化”,外部职业经理要想获得成功仍需要与企业主有较高的信任关系。



肖文

资产证券化在反抵押贷款中的应用

财贸经济.2005(1).-79-82

-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加大,目前国内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抵押贷款业务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有效补充正逐渐受到国内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重视:然而该业务实施过程中资金凝固带来的支付难题一直是其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从资产证券化这一新兴的融资模式出发,论证了反抵押贷款业务实施证券化的可行性,建设性地提出我国反抵押贷款业务实施证券化的基本流程和具体措施。





“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企业的作用”中日双边研讨会综述

叶建亮

2005 年 3 月 5 日—7 日,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企业的作用”中日双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爱知淑德大学、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丰田汽车公司等政府企业界人士近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以“产业高度化”为视角,在企业作用的层面上就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构建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理论与经验、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企业组织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产业政策

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合组织(OECD)在 1997 年出版了《2020 年的世界:迈向新的全球时代》(The World in 2020: Towards a New Global Age),不仅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同时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与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能成为与北美和欧洲并肩的世界经济第三极,成为许多学者讨论的话题。最具影响的声音来自 Krugman,他将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视为外强中干的“神话”的预见性研究使得人们意识到,即使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可能性并不被人进一步质疑,但也不得不直面东亚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为之寻找更为长久有效的出路。

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竹内常善教授认为,东亚各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条件必须包括国际分工的高度化和各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且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以往各国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往往对产业高度化做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即认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就是第二产业不断替代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又不断超过第二产业的过程,也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

述的情形。之所以说是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了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因为东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是在没有充分发展农业和能源情况下就大规模推动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国家则相当重视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primer sector）又被称为基础部门，不仅包括农业，也包括能源开采，它是其他产业赖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忽视基础部门的发展无疑大大削弱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竹内常善教授认为，必须推动实现东亚地区高度的产业区域分工，才能进一步实现东亚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在区域分工中，企业而不是政府应该成为主角。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小企业群体作为分工实施的基础，因此，中国和日本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为这种国际分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祥荣教授指出，以往东亚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遵循典型的“雁行模式”，即由日本到“四小龙”再到“四小虎”，各个先行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本国产业高度化。但是，这种途径下各国产业结构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同构性，每一个国家都成为“大雁”，而没有实现区域差异化分工。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和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于日本这只“领头雁”。而日本经济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低迷直接导致了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危机的到来。因此，实现产业高度的区域分工是十分必须的。

丰田汽车公司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东和男先生认为，以企业为主导展开区域分工生产是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制造业生产领域，东亚地区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并不弱于欧洲和北美，但是在制造业的装备生产即母设备（mother machine）制造上，与欧洲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小企业吸收外来技术、提高产业配套能力，见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南京大学商学院郑江淮博士也认为，产业配套体系的构筑在区域分工展开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构筑大大提高了区域整体竞争能力，使得区域分工带来的产业风险大为弱化。另一方面，给予区域分工所形成的完善配套，使得即使出于市场谈判劣势的企业，仍然可以在这个配套体现链中增加自身谈判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积累率和技术创新基础。

金祥荣教授以中国的经济开放与产业高度化为进程为例，论述了如何发挥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作用。他认为，中国开放近 30 年来在出口与产业政策上实施了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消费品的出口导向战略。总体而言，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但是，中国巨大的贸易出口对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熟练工）作用巨大，同时贸易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然而，必须不能回避的是，中国的贸易出口

推动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很强的制度扭曲痕迹,这与西方国家内生化的国际贸易在机制和效果上相去甚远。一方面,国有企业参与的合资和贸易难以有效吸取国际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国内贸易环境恶化和外贸补贴导致了过度的出口,使得贸易企业外贸出口并非追求规模报酬递增。目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会对民营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形成伤害。因此,推进产权改革和强化契约实施的保护是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

日本亚洲研究所所长东茂树教授则指出,政府对贸易和投资干预应该在开放的条件下实施的,其主要目标除了推动本国产业高度化、促进就业以及获取更多外汇储备之外,应该还包括促进竞争。为此,政府的产业政策不应该过度介入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决策过程,也不应该抑制或促进企业走向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进程,以此获得政府自身的某个目的。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则从市场结构和竞争效率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引进外资中的产业政策。他指出,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不适于分析跨国公司投资过程中的绩效讨论,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的分析。最早由海默(Hymer, S.H.)提出“垄断优势论”,以及后来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 F.T.)提出“寡占反应论”等,在理论上表明,在母国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跨国公司所在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但是跨国公司通过 FDI 是否将导致到东道国市场集中度提高则并不一定。他认为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东道国对其影响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因此一般利于提高东道国市场集中度。中国 94 年以来的实证表明了这一点。但是,类似于汽车等重化工业产业,中国的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如何既发挥市场集中度所带来的规模与技术创新的优势,又避免过度集中造成的垄断损失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所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一方面要重点引进“寡占反应”型跨国公司,即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都会引起其竞争对手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要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国际贸易强化市场竞争。同时要对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采取适当的政策干预。

二、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技术创新

各国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引进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发挥企业的作用,推动本国产业的高度化。日本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山下彰一教授就泰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来论述产业高度化的内在机制和有效产业政策。他指出,泰国 60 年代开始才起步,在 1984 年之前,泰国的汽车产业仍然相当薄弱,年产汽车不足 10 万辆。90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全球皮卡生产基地,以日本丰田和美国通用及福特为主。泰国汽车产业的巨大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有效产业政策。在上世纪 50 年代,泰国政府就出台了《投资激励法》,该法只鼓励本国投

资而不鼓励外国投资，在当时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基础上，该政策以失败告终。1962 年泰国政府修改了《投资激励法》，重点是引进外资，主要政策表现在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用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当时大量的国际汽车企业进入泰国。但是不久泰国政府调整整体关税，提高零件国产化率。欧美汽车企业对泰国国产零部件率提高非常失望，退出泰国，只有日资企业留下了。之后日资生产商在泰国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一、二级供应商，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汽车零配件产业体系。纵观泰国汽车产业高度化，可以看到，一方面一个产业的发展 and 提升必须具备很长的助跑时间，建立了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提高国产化率，培育强大的零部件产业体系，对于产业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郑江淮博士也认为，泰国政府在早期从投资政策转向零部件国产化率的政策对中国非常有借鉴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东亚各国产业高度化所可借鉴的模式应该是韩国而非日本，大力推动国产化率和本地配套率，鼓励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配套还远远不够，使得外资对本国产业提升的功能未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泰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政府产业政策的适当调整，可以大大加快本国产业的高度化进程。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吴晓波教授详细分析了中国外资引进与产业高度化的内在关系。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FDI 引入国，发达国家制造业占 GDP 比重不断下降，但其对制造业的核心的控制加强。中国制造业产业高度化所经历的路径是基于后发优势还是处于被边缘化的通道仍然是一个值得警惕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事实上，中国技术引进与制造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以下的困境：（1）加速了制造业向产业链末端移动，如电子产业空芯化和自有品牌的消失；（2）产业利润率低下；（3）技术进步贡献率低，并呈恶化趋势，装备工业、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其主要原因在于：（1）引进技术先进性不强，主要引进成熟技术；（2）技术扩散效应差，关键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率低；（3）消化吸收技术的费用比率低（4）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内部化。要改变这种局面，政府应起更大作用，引导产业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企业层面上推行二次创新，结合中国的要素优势和需求，中国技术能力提高，重要的是对引进的技术二次创新，注意动态地吸收新技术，推动企业从后来者，变成跟紧者，再逐步上升到引领者。

国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滝井贞行博士则认为，技术引进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很多人往往将技术引进理解为所购买的设备或者是专利，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技术是要经过大脑，进行学习反馈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目前的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并不是很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外资引进对中国本土产业的提升效应。而政府试图通过“市

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对技术本质的错误理解，忽略了技术的人格化特征，忽略了技术的学习反馈环节。从丰田的成长经历来看，起初也是借鉴美国通用与福特的经验，翻译和阅读其相关的论文和技术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不断进行数据测试和实验，并不断设计更好更便宜的技术，只有这样，丰田才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提升其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所以，产业高度化和技术引进，必须通过企业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能称为自身的技术。

日本爱知淑德大学浅井敬一朗博士则进一步从生产过程详细分析了技术创新过程。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用机械软件来代替人的手、脑的过程，是用工学技术和人的技能的结合，而人的技能包括知识的技能和动手的技能。生产技术的创新与技能传承的紧密相关，因为技术革新对已有技能的影响有三个方面，放弃、不变或者革新。工学式的技术会随着新的发展而陈腐，物质的工学技术的陈腐就需用要人的技能来填补。日本很多企业尤其是汽车企业一直到 80 年代末都还轻视技能，从 90 年代开始，一些大企业日益强化员工技能的训练，包括基本技能、基础知识的岗位培训，既有加强只是技能深度的 OJT（在岗培训），也有扩大知识宽幅轮岗培训。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的很多企业认为技术是可以外来导入的，往往偏向于猎头公司，而日本则倾向于自己培养。因此，一个企业要提高技术，必须在先进的设备、技术导入的同时强化技能培训。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黄先海博士认为，在中国推动产业高度化和技术创新必须十分注重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强调过程创新的重要性，把一种技术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在中国，现有的产业技术水平达不到最大可能水平，存在落差，弥补落差就是要技术创新，工学技术可以购买，技能技术只能通过培养，无法购买，过程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员工的重要性，当前在中国大造“世界制造业基地”背景下，尤显重要。因为就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而言，美国的优势在研究（R-Research），日本的优势在开发（D-Development），而中国的优势在制造（M-Manufacture），处于价值链底端，要改变这种状况，强化过程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二是必须强调过程创新中微观体制安排的重要性。随着生产力发展，分工细化，因此协作成本提高，形成了分工悖论（史密斯悖论），日本的模式提供了解决这一悖论的路径，在分工的基础上强调了强调协作和团队的作用，即合作资本主义而非个人资本主义，包括在员工的技能培养上，既强调深度，也强调广度。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德明博士认为，为什么中国企业是美国的 R 模式、日本的 D 模式，而用中国自己的 M 模式，必须挖掘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很多企业只是从事制造业的加工生

产，而不是 R&D，这，与市场体制、制度环境有关，而不能仅仅从企业个体层次来考虑。

三、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企业行为

与会学者还着重就产业高度化过程中的企业应采取的行为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东茂树研究员以泰国正大集团和中国华源集团为例，比较了国际投资和产业发展中的企业的不同行为及其效果。他指出，分析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原因。主要理论有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产品成熟期决定竞争优势是价格”。但是该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相互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投资不仅是价格优势，还有产品差异化。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有三种类型：（1）发达国家的未开发市场；（2）规避当地的贸易管制的进口替代型的投资；（3）降低本国成本上升的风险的出口导向型。泰国正大集团从起初进口蔬菜种子开始，并向饲料生产和肉鸡养殖发展，并逐步形成“饲料—肉鸡—种鸡—鸡肉加工”等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其较早就进入中国，并迅速拓展至机械制造业和流通行业。而华源集团自从 92 年成立后，迅速进行了海外投资，包括（1）在尼日尔创建纺纱厂（1997 年），通过现地棉花采购降低成本（发达国家未发展市场）；（2）在墨西哥、加拿大（1999 年）创建纺纱厂，为规避 WTO 的配额制度。（3）在泰国（2001 年）间接出口到美国（出口替代型）。正大集团和华源集团的案例表明，在产业高度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着眼于发达国家没有开拓的市场，或者通过内部联盟和先发优势，克服其在技术和规模上的不足，从而形成有别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比较优势。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杨蕙馨教授以中国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为例，说明产业高度化过程中企业集团应如何强化行动效率和竞争能力。她认为，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集团形成带有很强的制度扭曲形态，或者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的命令下组成企业集团，或者是民营企业在政府鼓励和压力下组建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主要通过股权控制（母公司派人进入子公司董事会、经理层）、组织控制、知识控制、共同愿景等协调集团行为。企业集团行为与目标的不一致性十分突出，大大降低的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能力。鉴于传统控制方式的局限性，应该提倡多种方式和股权结合，尤其是母子公司共同愿景的建立。这在中国现实企业集团中可能更有意义，因为中国企业集团多为跨部门、跨地区的。通过多渠道的股权结合形成的企业集团能最大限度化解目标不一致性带来的行为扭曲，提高企业集团的整体竞争能力。

竹内常善教授也认为，企业组建集团后，尽管具备了规模上的优势，但是如果不能很好的加以整合，并协调内部关系，那么并不能发挥集团应有的效果。日本也有很多的企业集团，

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不过比较成功的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集团各公司的管理和决策模式是灵活的，子公司如果发展壮大可以替代母公司成为决策主体；也有比较松散的集团组成形式。不过日本企业集团发展的经验表明，单方面的支配型管理体制下的权威管理往往使企业集团丧失生命力。

东和男先生则指出，丰田公司也曾经采取权威式的管理模式，强力控制子公司仅能与本公司交易，但是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公司一段时间的不景气。后来，公司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管理模式，允许子公司自由交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整个公司的共同愿景尤为重要。如果通过并购，将价值理念完全不同企业容纳在同一个集团之中，结果是或则母公司强力控制子公司而造成企业活力丧失，或者子公司各自实现不同的价值目标，而导致母公司无法实现其价值目标，并购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因此，在企业集团组建尤其是跨国投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集团成员共同价值目标的建立。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储小平教授则进一步从企业微观角度解读产业高度化。他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企业组织有关，企业组织又和企业能力有关。推动现代工业企业不断发展的核心能力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成长有三个典型的模式，即竞争式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个人式资本主义的英国模式和合作式资本主义的德国模式。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应该如何构建其独特的组织能力？为此，储小平教授认为，应该从构建“理念型心理契约”入手，形成中国独特的企业组织能力。之所以必须强都构建心理契约是因为：（1）组织能力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动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地理、国内市场规模、制度、文化等。（2）高层管理者的学习能力和团队的在现代企业中至关重要。（3）企业组织能力和知识的获取能力、积累能力在不同国家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可移植性的企业治理结构等显性制度外，必须根据不同企业和员工的心理文化特征，形成独特的契约结构。他以 30 年代荣氏企业的“劳工自治区”和当前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为例，说明，心理型契约的有效构建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管理成本。相反，若职业经理人对企业主在价值观、原则、理念的可信承诺并不持十分认可的态度，则对企业发展的消极作用显著。

东茂树博士也认为，从微观角度研究产业高度化问题时非常好的视角。在讨论企业组织能力的时候，一般人都套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所谓标准的治理结构模式。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IMF 就向泰国政府建议，要提高家族的透明度，改革企业制度，使所有权与治理权分离，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这一举措恰恰忽略了各国文化不同。在调整法人治理结构

时，并不是只有美国模式法人治理结构最有效。调整法人治理结构有英美模式、德日模式。美国、英国只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德国、日本更重视利益相关人，其中就包括员工。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因该实现不同的企业组织和契约形式，否则并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义乌国际化：战略意义、转型方向和制度支持

金祥荣

义乌市场创建 20 多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交易中心，并经过几个阶段的转型和创新，市场日趋转变为以“货样销售和无形贸易为主的共享式销售网络”，巨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获取，以信息搜索为主的交易费用的持续下降，市场已构筑起了一个可持续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机制，形成了巨大的克鲁格曼意义“母市场效应”，给中国的劳动密集型非耐用消费品构筑起了一种全新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国家竞争力，支撑着义乌市场及其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国际化的程度、深度和范围的持续扩大。本文试图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筑新的国家竞争力这样一个国家战略意义的高度及理论逻辑，来解释义乌市场的国际化，厘清义乌市场国际化转型和创新的主要方向，针对国际化中面临的“政府失效”等制度约束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一、新开放观与义乌国际化的国家战略意义

从义乌市场国际化的规模水平、作为企业共享式销售网络的集聚规模及其功能、巨大的自我增强的“母市场效应”、以信息搜索为主的交易费用的大量节约形成的全新的内生比较优势、义乌市场国际化引发的新的贸易增长方式等视角考察，义乌市场及其国际化不仅是个世界性的创举，而且在国家层面影响着中低档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国际化的深度和范围。因此，义乌市场的国际化，具有国家战略意义。

1. 义乌市场已形成中国以至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国际交易平台。以一年 35 万标箱的出口交易量估算，2004 年通过义乌市场出口的商品出口交货值达到 1000-1200 亿元人民币，并仍以 30-40% 的年增长幅实现出口贸易扩张。全国许多规模以上企业（在义乌市场设商位）

通过自营出口渠道异地交割的出口贸易,成千上万其他企业接受义乌市场集聚和辐射异地交割的出口贸易等都是难以估算的,从义乌市场物流与商流、信息流分离的程度分析,义乌市场上上述的贸易创造额大约在 500 亿元人民币。这样的交易规模数据本身意味着其十分重要的国家意义。义乌市场已与 200 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经贸往来关系,商品出口市场总体上已实现从低档市场占领到中高档市场渗透的转变,以香港、台湾的主要产地的进口商品也纷纷通过义乌市场这个平台进行全球贸易。因此,义乌市场已形成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非耐用消费品举足轻重的出口基地。

2. 义乌市场已构筑起一个报酬持续递增的内生增长机制,跳出了世界经济史上工业品专业市场消亡的历史陷阱。自从专业批发市场在浙江兴起以来,根据已有的理论逻辑和世界历史经验,“市场消亡论”一直是主流观点。主要基于高档品牌商品为了发挥经营上的规模经济优势,生产企业必定实现外部营销网络的内部化,也即建立自有营销网络。但是,从义乌市场提供的经验看,企业产品销售是选择共享式的销售网络,还是自有销售网络,也即用企业替代市场,还是用市场替代企业,其权衡的是经营上的规模经济节约与专业批发市场引发的节约谁大谁小。因此,决定专业批发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因素,是能否形成一个以信息搜寻为主的交易费用持续下降的报酬递增机制。欧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形成的大量工业品专业批发市场,大都在工业化中后期都消亡了,这构成了一般市场主流理论的主要经验依据。而义乌专业市场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为主的转变,从现货交易到货样销售模式的转变,从国内批发到国际化的转变,已完全跳出了世界专业市场消亡的历史陷阱。当时欧美国家的工业品专业市场都没有升迁至无形市场、货样销售和国际化阶段,就逐步萎缩消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义乌市场可为世界性的创造。

3. 义乌市场创造了全新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了巨大的“母市场效应”。已被大家皆知的一个奇事是,在专业市场买个同样产品比直接到厂家买还便宜,批量和品种、规格等组合范围越大,这种便宜程度越大。这就是专业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的节约。从规模经济而言,首先起作用的是只要每个商位经营上的内部规模经济比单个厂家来的大,就能带来成本的节约;其次,整个专业市场的规模经济(对每个商位而言是种外部规模经济)又构成买家范围经济方面的节约,当然每个商位本身比厂家有更大的范围经济,因为每个商位背后都有数十个以至更多的生产企业提供货源。专业市场中这两个层面的范围经济,给后道批发商带来了巨大的搜寻费用、信息搜索方面的节约。目前义乌已有商位 5 万个,从业人员 20 万,汇集了 34 个行业 1502 个大类 32 万种商品,占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的 50

万种商品目录的 3/5 强。义乌市场成为全国各地中小企业包括大量生产高档品牌日用消费品企业共享式的销售网络。义乌市场把全国日用品生产企业在空间上和产品上的巨大差异全部汇集起来，所带来的以信息搜索为主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巨大的。随着义乌市场确立起货样销售模式和向无形市场为主的转变，引发了物流与商流、信息流的逐步分离，进一步带来了物流运输和仓储等费用的大量节约；而且，在货样销售的条件下，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获取已突破了无形市场环境容量的限制。这一方面给每个商位带来了经济成本的节约，另一方面给整个市场的物业经营带来了大量组织、管理费用的节约。正是从第一代至五代义乌市场的变迁，逐步构筑起了以不断扩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基础，以不断下降的信息搜索费用为主的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形成了巨大的“母市场效应”。这种“母市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义乌市场已形成全国同类日用消费品的信息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第二，义乌市场开始对其它地方性专业批发市场产生“极化效应”，首先是浙江其它地方同类中小型专业市场的萎缩和消亡是必然的。第三，义乌市场在流通环节创造的这种比较成本优势是全新的，它是抑制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和人民币升值制造业离散转移的重要力量，义乌市场的国际化又在扩大市场范围方面发挥产业集聚的作用。

4. 义乌市场的国际化是贯彻落实新开放观的典范。长期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严重依赖出口补贴、贷款贴息、出口退税等，是具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出口创汇模式，扭曲了比较优势和出口贸易。而义乌市场引发的出口贸易，不依赖任何政策性支持，从生产企业到市场商位其目标函数都实现了从出口创汇到出口创新的转变；其次，义乌市场创造的全新的内生国际比较优势，依靠巨大的共享式销售网络形成了重大的国际集合和集聚效应，推动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贸易具有内生性增长的性质；第三，在激励性外资政策下，中国的贸易结构停留在“以外商为本”的阶段，三资企业的外贸出口占到中国出口贸易总量的 57%。而义乌市场的国际化不仅在带动就业，而且在培育民营企业等方面推动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实现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二、推进市场组织创新，提高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义乌市场的持续繁荣和能不断转型升级，其根本原因是构筑起了一个可持续回报递增的内生增长机制。但是，在义乌市场的国际化过程中，从市场的微观基础、市场规模扩张方式，到商业企业家的成长、国际市场势力的构筑等方面，都存在着内生机制运行脆弱甚至伤害的种种机制障碍，需要通过新一轮的制度改革和市场的转型创新，支撑可持续回报递增的内生增长机制，在国际化过程中顺利运行。

1. 构造现代商贸微观基础，激活微观创业、创新能力。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流通领域曾经历过两次商业革命，也即零售革命和批发重组。在工业前向一体化和零售后向一体化夹击下，独立批发商的地位下降，出现了批发业重组和改革，（1）批发业横向结合，若干批发商联合，形成规模经济优势；（2）批发业专业化和细分化，从一般商品门类分工转向商品的品种分工，加强品种深度，获取规模经济。从而崛起了一批大型品牌批发商，他们与品牌零售商、品牌制造商一起通过国际化，在国际市场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势力，几乎把世界所有的行业或商品纳入了他们的市场势力范围。生产上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中间品或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如汽车、钢铁等产业部门，由品牌制造商通过产业资本的价值链驱动，在研发、生产和规模经济方面构筑进入壁垒和核心能力；生产上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非耐用消费品如服装、鞋类等产业部门，由品牌零售商和品牌批发商通过商业资本的价值链驱动，在设计、市场营销和范围经济方面，构筑进入壁垒和核心能力，控制和影响市场价格以及品牌、网络、设计等高端价值环节，而生产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企业只是他们全球化外包网络的组成部分，只是提供标准化的货源，获取增殖贫乏的加工制造利润。这样的国际背景应是义乌市场国际化转型方向的重要理论和经验参照系。对浙江以至中国来说，民营经济进驻的产业部门基本是非耐用消费品，这些产业部门市场势力形成完全是要靠商业资本及其企业家驱动的，当然不排斥工业资本及其企业家的转换。因此，对义乌来说，推进市场国际化，要把义乌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商贸中心，很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发现和培育商业资本家的机制。商业资本的积累，大型商业企业的培育，大商业资本家及其企业家的发现，对义乌来说更为重要。为此，应在市场内放开激活商位交易和流动，把有限的商位向经营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家”集中，在融资等政策支持方面，更多地向商业企业倾斜，加速商业资本积累；推进商城集团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把商城培育为有相当市场势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大型商业集团。

2. 提高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和进入壁垒。从义乌市场及其国际化的现状和问题出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强化降低信息搜索费用为主的内生增长机制：第一，在货源销售为主的模式下，市场规模的继续扩张应引导附带信息量大的产品进场，推进物流和信息流、商流分离的进程，完成向完全货样销售和无形贸易市场的转变。第二，根据范围经济原理，异地以至跨国建立分市场是不明智的举措，会伤害市场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第三，在货样销售的模式下，高档品牌商品也具有经济性；开辟进口产品的市场交易并大幅度提高其比重，能强化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尤其是大大提高市场国际化中的学习、知识溢出水平，

逐步实现市场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国际到卖国际的转变。

3. 重组批发业，构筑市场势力。现阶段，义乌市场都是通过国外一些分散、小型的独立批发商把产品分销至世界各地，基本上进入的是非主流的销售网点，以满足消费者的价格偏好为主，价格低、被反倾销调查屡见不鲜，义乌不应把纳入国外品牌零售或批发商的网络作为发展的目标模式，这样只能使义乌获得增殖贫乏的二道商业批发利润，并锁定于国际价值链分工中低端层次。正如前文所述，义乌应自主开发价值链，培育自有品牌、网络、设计的大型商业企业或集团，培育和发展商城集团的商业性品牌、商标，逐步推进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并向零售和生产领域渗透、控制，构建具有市场势力的品牌经销商；随着摊位经营户向公司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引导和支持贸易企业自愿连锁，组建合作社联盟和商业集团；随着高中档商品进入市场货样销售网络，积极发展与国际品牌零售、批发商的合作经营，条件成熟时，通过证券投资并购方式，取得国外商业企业的部分或全部控制权，这是快速形成和构建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最佳途径。

三、义乌国际商贸城市的崛起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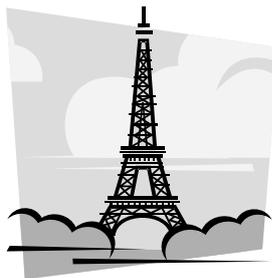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固有的区域要素禀赋优势推动了大规模商贸业集聚的内生形成，使义乌一跃成为具有超地方战略意义的、全国首屈一指的内陆国际开放城市。2004 年，在义乌市场直接和间接形成的出口贸易达 15,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通过义乌机场的境外客商达到 79552 人；在义乌持外国人居留证的外国客商有 675 名，涉及 40 个国家和地区；有 8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名外商常住义乌从事经贸活动；云集了国内专业外贸公司代表机构和货样机构各 600 多家，全球 20 强海运集团已有 8 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义乌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户籍人口 68 万、暂住人口 75 万，流动人口 20 万的大城市。从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义乌这个区域空间经济活动的内容、规模和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

随着义乌行政区域空间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在义乌行政区域内提出了有关涉外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大规模需求，包括陆地口岸、外商邀请权、企业因公出口签证、外国人居留许可签发权、涉外经济纠纷司法执行权、外商投资商业领域和外企登记承办中介服务机构的管辖权，以至境外人员卫生检疫监测和管理权限等等。由于中央或上级政府没有根据义乌行政区域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性质变化，调整或赋予尤其是涉外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有效管辖权，在义乌出现了大面积政府涉外经济保护职能的缺损和失效，国内外商人的涉外经济活动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激励。涉外经济纠纷大部分得不到立案或有效调解；贸易合约得不到有效保护和实施；由于外企驻华代表机构的登记承办主要在省级有关部门，在

承办过程中存在重收费、轻服务、不管理的现象；外商邀请和外国人居留许可签发权在金华和省里，由于往返时间较长等因素，影响了有关商务活动的有效展开；缺乏机场口岸、海关等只是上级政治授权的延伸服务等，主体利益驱动下提供歧视性服务等等。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崛起，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义乌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了市场机制发挥要素资源在空间配置中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应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如何解决“义乌困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人作为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以人为本还表现为人的政治、文化、经济权益，把经济社会发展与健全民主、法制，保障人的各项权益结合起来，真正体现发展为“人”服务的核心理念。因此，从尊重义乌的创造，维护义乌国际化的发展势头来说，解决“义乌困境”最有效的选择，是借鉴对沿海开放城市宁波、大连、青岛、厦门等进行直接政治授权的经验，给义乌应有的涉外经济管辖权进行直接授权。还应阐述的最重要理由有：第一，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其消费主要限于提供该物品的政治管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者。因为其价值的丧失不是由于拥挤，而是由于物品或服务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所以，较低层次的政府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或服务是最有效的。其次，地方财政分权制的条件下，任何上级政府的延伸服务或间接授权，都存在服务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必然出现政府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歧视性服务等问题。因此，确立较低层次政府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真正“主体”地位最为有效。第三，对义乌给予直接政治授权，同时可以解决目前义乌出现的许多尤其是涉外经济与社会管理方面公共物品或服务严重紧张和拥挤问题。现行的政府机构编制是按照户籍人口定编的，致使义乌市公检法和其它许多部门编制缺乏、人手紧张，严重妨碍了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有效提供。

（本文系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在 2005 “义乌论坛” 上的主题发言，发言稿在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内参《决策建议》8 月号上刊出）





时事评点

人民币升值，各行影响几何？

2005 年 7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调整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2005 年 7 月 21 日 19 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 1 美元兑 8.11 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央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传闻已久的人民币升值终于落槌。对各行业影响评论不一，为此，我们收集了《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几家财经报纸对人民币升值的行业影响的分析文章，并将其综合如下：



纺织行业：冲击最大

研究员普遍认为，受人民币升值冲击最大的无疑是纺织服装行业。根据有关研究，人民币每升值 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 2-6%，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不过一些利润率较高的龙头企业，由于产品成本中贸易品占比相对较低，因此利润率下降的幅度也较小；加之议价能力较强，受升值的负面不太大。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负面影响体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来看，

假设产品出口价格和出口量保持不变，那升值的直接影响就是压缩行业利润空间，以 2005 年前 3 个月行业 2.9% 的利润率测算，若人民币升值 2.9%，行业利润率为 0。从动态来看，行业的提价，成本的控制以及财务上的运筹等都会规避升值对行业的负面影响，但升值对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只能部分规避而无法克服。

航空股：最大受益品种

升值对航空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升值当期将产生一次性账面汇兑收益。航空公司的外币负债率非常高，有大量的航空器材融资租赁负债，每年需支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费用和本金。二是在长期内将使航油成本、飞机和航材的价格、经营性租赁和维护费用等支出降低，航空公司毛利率上升。由于航空公司的燃油 30% 以上需要进口，人民币一旦升值，航空股的航空燃油开支大幅降低。此外，由于国际航班是按按外币收费再折算成本币，人民币升值后这部分收入会有一定减少，不过影响不大。而人民币升值同时还将促进航空出境游的快速增长。

房地产：刺激热钱流入

人民币小幅升值会使得外资预期国内房地产未来形势走好，会刺激热钱流入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需求增加，对目前国内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有一定抵消作用。人民币升值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主要在于预期效应和资金流入效应。人民币升值一般意味着国内经济整体向好，投资机会多而且收益水平相对可观（至少可以得到额外的汇兑收益），因此将有大量的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房地产等市场由于流通性较好将成为这些资金集中的场所，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扬。此外，资金流入还会带来财富效应。由于资金面的充裕以及整体经济的景气，居民的收入水平将得到较大的提高，房地产作为消费升级的主要聚焦点将得到大家的追捧，从而提升对房地产的有效需求。

造纸行业：受益较明显

造纸行业相对其他工业生产行业所受的影响较小，因为该行业进口原料所占比重较大，我国造纸行业原材料的 35% 来自国外，而产成品主要在国内销售，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从外部进口原材料变便宜了。在规模企业中，原材料进口占总比重最高的达到 60%—70%，人民币升值将使得其成本下降，因此造纸业也是人民

币升值受益较明显的品种之一。

旅游业：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中信证券目前，我国入境旅游者中，香港同胞所占比例最大，为 6 成多，外国人仅为 1 成多；但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中，外国人比重接近 5 成，香港同胞接近 3 成。在入境外国人中，亚洲占到 6 成以上，欧洲和美洲分别在 2 成和 1 成左右。从前 15 个主要客源国结构中可以看出，汇率变动能影响入境客源和国际旅游收入的主要是亚洲货币：日元、韩元、卢布和美元，以及香港元和澳门元。汇率变动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是价格效应。

中国旅游产品和服务价格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对本来就很便宜的中国旅游业而言，入境旅游者数量不会因价格效应而明显减少。况且，目前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旅行社和酒店内部即可消化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的价格效应。

汇率升值将通过收入效应对出境旅游产生明显影响。近年来居民出境旅游倾向不断提高，出境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将提高居民出境旅游消费能力，有出境游资格的旅行社将从中受益。由此也将分流部分原计划在国内旅游的人群，可能对国内饭店和景区的接待量产生影响，但数量轻微，可以忽略。

人民币升值商业受益

一是收入效应。从短期看，汇率升值带来财富增加效应，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增强，促进商品消费增长，商业零售业从中受益。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消费增速减缓，零售企业受损。二是价格效应。主要体现在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产生与收入效应的叠加，刺激消费增长，使零售企业受益。其中受益比较明显的是进口商品销售比重较大的百货业态公司。三是渠道效应。汇率升值后，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先前国内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商将寻求国内渠道作为替代，由此在商品供给数量和价格上使商业零售类企业受益。销售终端对供应商的谈判力也将显著提高。这其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具有渠道优势的连锁商业。

人民币升值也对国际商业资本的进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积极因素看，汇兑收益将促进已进入外资的扩张，从消极方面看，初始资本门槛提高将对新资本的进入产生抑制作用。就目前情况看，国际商业资本主要在国内采购，因此升值

后，商业领域的内外竞争将进一步强化。另外，人民币升值也将通过地产价格效应促进商业店铺租金的提高，由此那些具有商业地产资产的企业也将受益。

对石油石化等行业利弊不一

汇率是一个影响石化行业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大宗原材料部分。汇率的变动直接构成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于不同子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从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汇率的升高必然会降低进口的门槛和增加出口的难度。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主要是进口，例如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在这方面的优势是资源，而不是技术。因此，汇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强化附加值高产品的进口，导致国际产品对国内市场占有的加剧。同时，会更加压榨资源类化工产品的利润空间。

对原油开采业的影响。对于原油开采行业，目前我国进口依赖度比较大，按照 2004 年的数据测算，我国原油的进口依存度达到 40%。国内原油价格是根据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原油价格制定的。这就存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 1%，进口的原油价格用人民币衡量就会相应降低 1%。对国内原油开采业来说，售价也将下降 1%，对开采业的影响是不利的。

对炼油行业的影响。对于炼油业，由于人民币升值 1%，则原油成本相当于下降 1%。而成品油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区间机制，售价不仅仅与国际定价有关，还与定价机制有关。因此，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成本并不联动。如果成品油的价格下降幅度小于原油的下降幅度，对炼油业将构成利好。在目前的定价机制下，成品油的价格调整滞后于市场价格的变动，因此，由于人民币升值将直接构成原油进口成本的下降，对炼油业带来利好，这种利好的持续性将决定于政府对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幅度和频度。

对大宗化工品的影响。对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来说，目前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格局。虽然国内产品供不应求，但如果人民币升值，进口产品价格的走低将加剧国内市场竞争，对国内产品价格将产生压制作用。而成本方面，石脑油是受汇率和定价机制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中游产品的价差空间有可能缩小。汇率的下降将引导国内产品价格同幅度的下降，而成本取决于多个因素，因此，汇率最终的影响结果是终端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大于成本下降

的幅度，对大宗产品带来负面影响。

对综合类石化公司的影响。对于综合类的石化公司来讲，主要的原料供应来自国外，如原油，而自己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所以汇率上升将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但自己的消费市场可能面临国外低廉产品的冲击。对于国内本身就自给率不高的市场来说，由于人民币升值，进口产品主导价格带来的价格下降将大于成本降低的幅度，汇率上升给这些企业带来负面作用。对于终端产品来讲，汇率的波动也将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利润，由于其上游和自身的产品价格都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最终的结果将是上游成本传递的效应和自身受国外竞争压力作用的综合体现。

总之汇率将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对石化子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求将部分抵消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同时，汇率因素虽是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在 5%-10% 之间，这样的一个幅度不构成对石化行业的根本性影响。



对钢铁企业影响不同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钢铁产业降低成本。对于钢铁行业，目前为净进口国，其中 2004 年进口钢材、铁矿石、废钢分别为 207 亿美元、127 亿美元和 23 亿美元，全年进口总额为 357 亿美元。2004 年出口钢材、钢坯、铁合金分别为 83 亿美元、23 亿美元和 26.5 亿美元，合计出口总额为 133 亿美元。

随着进口铁矿石总量和占比的逐年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有利于钢铁行业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中国钢铁工业的竞争能力。考虑到中国钢铁企业产品市场主要为国内市场。目前我国长型材的市场供求主要受国内供求的影响，板材特别是薄板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十分密切，但是，目前国际市场板材价格明显高于国内市场，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钢铁行业总体是利好。



本简讯全部内容可免费登陆
<http://www.crpe.cn> 阅读或者
致信致电本中心索取。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地 址：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四楼

邮 编：310027

电 话：(086) -571-8975-2835

传 真：(086) -571-8975-2835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网 址：<http://www.crpe.cn>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